

李宇明:到田野去 做田野派

李宇明

我国有56个民族,但语言却不止56种。《爱我中华》这首传唱不衰的名歌,其原歌词是:
五十六个星座,五十六枝花,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。五十六种语言,汇成一句话:爱我中华,爱我中华,爱我中华……

有人将“百度贴吧”上将“五十六种语言”改做“五十六族语言”;国庆60周年,宋祖英高唱《爱我中华》,歌词也改做“五十六族语言”(虽然字幕仍是“五十六种语言”)。一字之易,便实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和谐。

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有80多种,这也是当今学界通用、官方采用的说法。其实,1980年至1987年出版的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”,只描写了59种少数民族语言的简况,这反映出当时的认识水平。近20年来,通过诸多新语言的发现,中国的语言已有134种,这一数据,足令国人开眼,国外注目。

国家的语言决策依赖语言国情,国家的许多决策都需参考语言国情。比如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的认识,就影响到国家的语言政策、民族政策、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。过去,常把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理解为一对一,其实“一对一”只是一般情况,还有“一对多”、“多对一”等情况。民族与语言的关系一对多,即一个民族使用多种语言。比如景颇族使用景颇语、载瓦语、浪速语、波拉语、勒期语、仙岛语等语言;瑶族使用勉语、布努语、拉珈语、巴哼语、炯奈语等语言;珞巴族使用博嘎尔语、苏龙语、义都语、崩汝语等语言;怒族使用怒苏语、柔若语、阿依语等语言。民族与语言的关系“多对一”的,比如有些民族放弃或基本放弃了本民族语言,而转用了别的语言,如满族、回族转用了汉语;汉语便为多个民族所使用。在现实语言生活中,民族同语言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,需要仔细梳理。

新发现语言,多是学界不熟悉的语言,或是过去未被发现,或是了解些线索但未及调查,或是虽有调查但不全面不深入。这些语言,往往使用人口较少,处在濒危状态,或正在走向濒危。发现这些语言,记录下来,公布出去,就是莫大贡献。

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,还是国家重要的资源。它能够提供不可复得的语言样本。比如,四川贡嘎山一带的尔龚语,竟然有复辅音200多个,举世罕见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有一种倒话,是藏语和汉语的混合语。倒话表现出混合语的许多重要特点,为语言学家提供了难得的素材。

语言既是语言的资源,也是文化资源。哈萨克语有关马的毛色的词语350多个,形容骏马的词汇100多个,有关马的其他特征的词汇600多个,非马背上的民族,实难有这样的语言奇观。中国首批公布的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,其中传说、故事、号子、歌谣、戏曲等等,都无不牵涉到语言问题。

随着社会交通、通讯、传媒、教育等的迅速发展,许多语言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濒危。语言消亡了就难以复生,就此而言,语言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。仅论交际,一些语言消亡也许不是什么大事,但若从文化角度着眼,语言的消亡就是国家资源的流失。当前,国际上都在呼吁保护语言的多样性,尽力抢救濒危语言,因为语言消亡意味着人类将失去不可复得的语言样品,将失去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,将失去一些历史记忆。在国内,保护濒危物种、保护文化遗产、保护环境等等,呼声不断,社会也在迅速觉悟,但对于作为民族文化支点的语言,却并未引起广泛关注。《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》记载的60种语言,可以说是在抢救60座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,同时也是在敲击守望国家语言资源的警世洪钟。

新发现语言大都分布在边境、海岛、高寒地带、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，有些语言还跨境使用。调查这些语言所遇困难、所付艰辛，不说也可以想见。到田野去，才有可能发现新的语言线索，才能获取第一手的语言资料。到田野去，描写陌生的活语言，才能切实培养学力，提升学术水平。到田野去，才能掘得学术富矿，冶炼出具有理论意义的高品位的学术钢铁。重视语言的田野调查，是一种优良学风，是一种学术使命，是一种科学精神，也是获取学术真谛的不二法门。